

服務國家教育大局 培養高質量發展人才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9周年紀念日，明年便是回歸30周年。所謂「三十而立」，對一座城市如是，對一套教育制度亦然。回望過去一年，香港社會在改革與發展之間繼續前行；教育作為培養下一代、塑造城市未來的根本工程，更清楚呈現出兩個關鍵方向：一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二是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若從教育角度觀察，本文的意義並不只是總結一年工作，更是藉着回歸近30年的時間跨度，重新思考香港教育應當往哪裏走。香港教育不能只是培養「考試高手」，也不能停留於本地視野之內。今日的青年，既要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更要理解國家正在發生什麼變化，明白自身可以在國家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

鄧飛 立法會議員 教聯會副會長

融入，首先是一種視野的重建。回歸初期，香港教育在國民教育、國情認識、歷史理解等方面確有不足之處。部分青年對國家發展認識有限，對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的理解也不夠完整。過去幾年，隨着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推行，學校教育逐步把國家安全、國家歷史、國家制度與當代發展放回應有位置。這不是簡單地增加課內內容，而是讓學生在更完整的框架下理解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國民教育不應只停留在課本。當學生走進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參觀高新科技企業、航天科研基地、鄉村振興項目等，親身看見國家的產業升級與社會發展，比單純的課堂講授更有說服力。

主動參與教育強國建設

近年不少學校和大專院校積極推動內地交流、實習與科研合作，青年從「知道國家」走向「接觸國家」，再進一步思考如何「參與國家」。這種變化，是香港教育近年最值得肯定之處。作為立法會教育界議員，筆者在走訪學校時也明顯感受到，師生對「融入」二字的理解已比以往具體得多。不少學生主動設計大灣區創科考察和實習課程，讓學生接觸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等產業；高校亦積極配合國家「十五五」規

劃方向，圍繞北部都會區、北都大學城建設、產學研合作等議題，尋求與內地高校和科研機構更緊密的連接。這些工作說明，香港教育不再只是被動回應政策要求，而是主動尋找自身在國家教育強國建設中的位置角色。

積極培養服務國家人才

服務，則是融入之後更深一層的责任。香港教育的優勢，在於同時具備國際化視野、普通法制度背景、中西文化交匯經驗，以及「一國兩制」下的內聯外通獨特功能。國家在金融、創科、法律、醫療、教育、國際傳播等領域，都需要既熟悉國家情況、又掌握國際規則的人才，香港正好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香港教育服務國家，不是把香港特色削弱，恰恰是要把香港最有價值的部分發揮出來。基礎教育階段，要培養學生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格局；高等教育階段，則要圍繞國家戰略需要，在科研、專業培訓、國際交流方面作出更主動部署。

職業專才教育同樣如此，未來應結合人工智能、先進製造、現代服務業和「一帶一路」需求，培養更多能夠在區域合作和國際市場中發揮作用的實務型人才。近年特區政府在教育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正逐步體現這種服務大局的思路。例如，推動「留學香

港」品牌，吸引內地及海外優秀學生來港升學；優化獎助學金和人才培育安排；加強香港教師到內地研修交流，也邀請內地教育專家來港參與課程和教學討論。這些工作看似分散，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方向：讓香港成為國家連接世界、培養人才、促進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

回望29年的教育路，香港曾經歷價值認同的搖擺，也曾面對社會撕裂對校園的衝擊。今日「融入」與「服務」逐漸成為教育界的重要共識，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制度重整、課程改革、教師努力和社會反思共同累積的結果。過去一年，價值教育更見穩固，國民身份認同逐步提升；產學研合作不斷深化，創科人才培養加快推進；大灣區教育交流亦由零散活動走向常態機制。這些變化，正為香港邁向回歸祖國30周年積蓄更堅實的青年力量。

當然，站在「三十而立」之前，教育界不能滿足於已有成績。未來香港教育仍有兩方面工作必須持續深化。第一，國民教育要更重視質量與感染力，不能只靠口號和文件，而要通過實踐、交流、研學、科研和生活經驗，讓青年真正理解國家、認同國家。第二，教育發展要更緊貼國家戰略，以大灣區、北部都會區和北都大學城為重要平台，改革課程、師資、科研和人才流動機制，使香港培養的人才更精準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

英國法庭錯誤裁決 損害普通法體系公信力

崔劍 法律博士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日前英國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就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一案作出宣判：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彪因所謂「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判囚8年；前英邊防人員衛志樑同罪名成立，另加公職失當罪，合共監禁10年。縱觀全案，無論從法律條文的缺陷、庭審證據的邏輯還是雙重標準的操縱來看，今次判決都存在嚴重的法律瑕疵，不僅是英國法庭對國安法的濫用，將法律工具化的反面典型，亦損害了普通法體系應有的公信力。

條文模糊 實證不足

本案的定罪核心依據《2023 英國國家安全法》，這部法律存在嚴重的條文模糊的先天地缺陷，違反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有「口袋立法」之嫌疑。涉及本案的「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對關鍵概念界定極度寬泛，未設清晰邊界。

其一，何謂「外國情報機關」？條文把境外官方經貿辦這一依據本地法與國際慣例合法運作的公務機構，隨意歸入所謂情報主體。其二，「實質性協助」範圍毫無約束，哪怕僅僅核實外逃通緝人士的普通行蹤資訊，與英國本土軍事、機密情報毫無關聯，也可被認定構成犯罪。更關鍵的是，有關法律不要求檢方指明具體對應的外國情報機構，大幅壓低舉證門檻，允許陪審團基於主觀推定作出有罪判決。

本案舉證鏈條斷裂，缺乏客觀、實質證據支撐有罪裁決。辯方在庭審中多次提出核心抗辯：經貿辦依基本法第156條設立，所有聯絡、資訊核實工作均屬促進兩地經貿文化交流的正常公務，不存在任何刺探英國機密、威脅英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兩名被告全程否認全部控罪，主張其開展的資訊整理工作僅為配合香港執法機關追緝通緝人士，完全屬各國普遍開展跨境執法協助的常態操作，並未觸及英國軍事、國家機密等真正涉安全領域。但法庭忽視辯方提出的客觀事實與國際通行慣例，過度採納控方帶有預設有罪推定的敘事邏輯，甚至大量引用法案生效前的行為作為負面背景證據，以此引導陪審團形成先入為

主的印象。這一做法直接損害了被告人的公平審判權，涉嫌違反普通法下對證據取捨的規則。

從庭審披露細節可見，檢方未能提交任何證據證明兩人的行動損害英國國防、機密、基礎設施等核心安全利益，僅憑「收集在港通緝人士資訊」這一行為就機械套用模糊國安條款。辯護團隊曾質疑：若單純核實逃犯資訊就構成「協助情報活動」，全球各國駐外官方機構開展跨境執法協助都將淪為犯罪，明顯悖離國際慣例與法律適用的合理邊界。但法官未對該核心法律適用的爭議作出清晰、客觀釋明，未區分公務行為與國安風險，簡單依靠寬泛條文機械入罪，讓法律淪為針對中方駐外機構的打擊工具。

雙標操作損害司法獨立

更大的爭議在於英國政府採取雙重標準，一邊縱容羅冠聰等大批反中亂港分子在英策劃各類針對香港的分裂、抹黑活動，另一邊卻對香港官方僱員正常履職重判重罰。同樣是涉及跨境人員和跨境活動，英國採取兩套完全相反的法律尺度，可見本案並非單純的司法裁斷，而是借模糊法律條文干預香港特區事務、向中方施壓的政治操作。此種選擇性執法，不僅背離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讓英國常年標榜的獨立司法、人權法治淪為空談。

香港特區政府早已明確，經貿辦始終依據英國本地法律與基本法履行職責，所有工作均公開透明，旨在推動雙方互惠往來。袁松彪身為辦公室正式僱員，從事的是行政聯絡常規工作，根本不存在任何危害英國安全的客觀行為。英國法院忽視辯方完整抗辯邏輯，依賴存在先天缺陷的模糊國安法作出重判，不僅侵害兩名被告的合法訴訟權益，更對全球各國駐英經貿、外事機構構成「寒蟬效應」，讓正常雙邊交流蒙上政治陰影。英方應正視自身立法存在的漏洞，拋開政治偏見，尊重公平審判與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糾正本次錯誤判決，避免繼續以法律為工具製造對立、損害中英長期經貿交流的根基。

規劃夯實創科土壤 布局長遠產業發展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6月16至17日來港考察調研，給予香港四個方面的肯定，包括肯定特區政府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建設。與此同時，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亦以北部都會區創科產業發展為重點框架，向社會各界廣泛徵詢意見。香港如何在創科賽道上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需要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下，找到香港的獨特優勢與切入點。

以國際化優勢連接全球資本

近年來，不少內地科技企業選擇以香港作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地。這些企業以香港為跳板開拓海外市場，看重的不單是融資渠道，更是香港完善的國際投資者網絡、普通法法律體系，以及對接全球市場的窗口功能。這是市場以行動投下的信任票，也是對香港作為中國科技創新與全球資本連接點的高度認可。

因此，香港應進一步結合金融、貿易、法律等傳統產業優勢，主動對接內地科技企業的國際化需求，為其提供合規、融資、人才配對及國際市場拓展的支援服務。更應着力的，是將香港打造

成新技術應用的示範地，而非單純的技術研發中心。香港土地資源有限，在整個創科鏈條中，優勢不在於大規模生產，而在於技術的場景應用與商業化驗證。新能源領域是極佳的切入點，無論是電動車的普及推廣、新能源基建的部署應用，還是綠色金融與碳交易市場的機制建設，香港都可擔當技術示範與國際標準制定的角色，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生態在港聚集，形成以應用促研發、以示範帶規模的正向循環。

打好設施基礎 提供穩定鼓勵政策

同時，香港也應正視制約創科產業落地的深層基礎設施問題。創科產業的發展，特區政府的核心角色是打好基礎，包括穩定充足的電力供應、可負擔的住房與辦公空間，以及生產要素的順暢流通。其中，電力問題往往被低估。數據中心、人工智能運算、新能源充電設施等，對電力的需求龐大而持續。香港現有的電力基礎設施能否支撐創科產業的規模化發展，是香港五年規劃必須正面回應的問題。住房同樣如此，本地及海外科技人才落戶香港，面對的首要挑戰往往不是薪酬待遇，而是居住成本與生活質素。北部都會區的規劃，若能在創科產業用地之外，同步配套人才住房與生活設施，方能真正形成宜業宜居的創

科生態圈。創科發展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維度，便是政策環境的穩定性及社會對失敗的包容程度。我們今天談到電動車，可以清晰梳理出一條從技術突破到市場普及的發展路徑；談到人工智能，亦能倒推出從深度學習到大型語言模型的演進脈絡。然而，這些路徑，都是在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市場形成一定共識之後，才得以清晰呈現的。

這意味着，特區政府在推動創科發展時，應避免過早鎖定某一技術路線或商業模式，而要致力構建一個允許多元嘗試、允許失敗、鼓勵再出發的政策生態。香港五年規劃應進一步探索如何在監管框架之內，為創科企業提供足夠的試驗空間，讓敢於嘗試、允許失敗逐漸成為香港創科生態的文化底色。政策的穩定性亦不可或缺，創科企業需要在可預期的政策環境下做長遠布局，頻繁轉向或朝令夕改，只會令投資者卻步。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是香港社會凝聚共識、共謀創科未來的重要契機。香港既要善用連接中西、匯通資本與技術的獨特優勢，積極承接內地科技企業國際化的戰略需要，也要從基礎設施的完善入手，從政策環境的穩定着力，從容錯文化的培育用心。

大學排名之外 更要推動社會進步

鄧智鵬 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公共事務)暨傳訊及公共事務處處長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六月可謂國際高等教育界一年一度的「放榜月」，繼上星期「QS世界大學排名」公布後，《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於今天揭曉。兩項排名的關注範疇顯然不盡相同，分別從不同角度揭示香港高等教育的整體實力；若放在一起觀察，有助我們更好理解高教界的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

「QS世界大學排名」較着重傳統的「學術與科研」實力，而「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則較看重「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實力。後者以聯合國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框架，評估大學如何將學術能力轉化為解決現實世界問題，從而評估其對社會及經濟帶來的實質貢獻。若說前者較重視大學創造知識的能力，那麼後者則更關心大學如何善用將知識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促使院校正視可持續發展的議題。

切實回應社會挑戰

過去數十年，大學的角色往往被理解為教學與研究，但隨着全球面對氣候變化、人口老化，以及數碼浪潮等衝擊，一所「優秀」的大學除了發表高質量論文，亦需要思考如何把研究成果切實地回應社會正在面臨的複雜問題。

這種轉變亦與國家近年的發展方向相呼應。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提升國家創科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佔科技發展制高點，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換言之，高等教育已逐漸由知識創造者，進一步扮演創新推動者及實踐者的積極角色。大學角色的轉變並不罕見。回顧香港

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不同時代的大學也肩負着不同使命。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需要大量專業人才，高教界培育出多代支撐社會發展的人才；隨着金融、商業迅速發展，高等教育於九十年代逐步朝向研究型大學方向邁進。時至今日，全球發展愈趨重視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大學所培養的未來人才，除了推動基礎科研，亦需要思考如何把知識轉化為社會效益。

融入可持續發展理念

以筆者執教的嶺南大學為例，近年積極把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教學、科研及社會服務之中，包括成為全球首批為全校師生免費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院校，並將其列為必修科目，推動大學社群在數字時代下，能平等學習及負責任地使用AI；領導研發中英雙語的免費創新教學平台「IDEAL-Gen.AI」，促進教師快速創建優質教學活動，提升學習成效；同時與聯合國大學共建亞洲首個「聯合國大學—嶺南大學—道創新及科技中心」，促進不同學術背景的師生透過工程、數據科學及設計創新等跨學科知識，研發人道創新科技回應社會需要，創造實質的社會及經濟效益。

在今次「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中，嶺大200年的總體排名由去年第101至200名區間急升至全球第63位，首次躋身全球百強之列，並名列本港高等院校中的第三位。此外，嶺大更在多項可持續發展目標錄得顯著進步，包括在涉及教育機會、終身學習及社會影響力的「SDG 4：優質教育」項目，連續兩年位列全球第一，並在6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榮登全球第一、在7項目標躋身全球百強，涵蓋減少不平等、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以及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等範疇，反映高等院校近年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持續投入，已逐步獲得國際肯定。

架設民意橋樑 為長遠規劃建言

植潔鈴 立法會議員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亦正全速編制第一個香港五年規劃，以更主動積極的態度及決心把握國家發展的重大機遇，為香港經濟發展謀劃出一條更亮麗的道路，可說是具有歷史性的意義。日前，特區政府亦正式啟動了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程序，並預期今年第三季發表正式的報告。相信未來一段時間，整個社會也會熱烈參與，就香港如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發揮自身優勢角色發表意見，共同助力香港發展。

早在公眾諮詢前，立法會已透過協同研究及意見收集機制向特區政府提交專題研究及意見收集報告，以助準備之後

出台的公眾諮詢內容。這個近距離的參與，更讓筆者充分感受到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環境，對於政策的醞釀、制訂甚至落實執行，都帶來非常正面的幫助。立法會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議員已分成6個專題組，就香港五年規劃召開了4次會議。整個過程，立法會合共舉辦了99場諮詢會，接觸了超過4,000位不同界別人士，收集了一共570份建議書。這種高效的成果反映出整個議會通力合作，無分彼此，共同為民意匯集、建言獻策作出了積極的努力，有效支援特區政府的工作。

這種行政立法的衷誠合作，是過去反中亂港分子在議會發起政治惡鬥所難以想像，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的又一佳績，立法會可以在特區政府有重大構思或

者政策制訂前及早參與以及提前作出建議，讓特區政府及後推出的建議或政策更有效回應社會實情，更具政策的可行性。

未來一段時間，隨着公眾諮詢的開展，筆者亦會把握這個機會深入社區，一方面向市民宣講香港五年規劃以及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重要意義，同時利用社區網絡收集地區人士的意見，以便轉達特區政府，將市民的建言吸納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之中。總體而言，香港一方面需全力做好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工作，另一方面亦要破除舊有的發展障礙，利用好中央的政策支持、社會的穩定局面以及行政立法的融洽關係，團結整個社會全力投入經濟建設，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讓市民更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